



两河流域： 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

Mesopotamia: From Village to City State

杨建华 著

 科学出版社

014034988

K124
10



两河流域：
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
Mesopotamia：
From Village to City State

杨建华 著



科学出版社

K124
10



北航

C1714586

内 容 简 介

本书按照考古学研究的三个层次对两河流域进行了系统研究：基础研究以考古学文化为单位建立时空框架；中层研究对社会经济、社会组织和宗教艺术进行重构；最高层次是通过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比较，重建两河流域从平等社会的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的历史过程。

本书适用于从事西亚历史、考古、文物等研究的专家学者及相关院校师生阅读与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杨建华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03-039788-1

I. ①两… II. ①杨… III. ①两河流域文化—研究 IV. ①K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8692号

责任编辑：宋小军 赵 越 / 责任校对：郑金红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谭 硕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3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4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2 插页：4

字数：500 000

定价：9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本书出版得到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1FKG006）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华文明探源及其相关文物保护技术研究（2013~2015）项目课题——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整体性研究（2013BAK08B09）”

资 助

此书献给林志纯教授和杨镇雄教授

序

不知道什么时候一些国人出现了这样一种心态：不去观察外国，却只看外国人是怎样评论中国的人、事、物，甚至他们的眼球中是否有中国的人、事、物，凡被外国人点头的人、事、物，乃至进入外国人眼球的中国的人、事、物，都认为是好的，并由此产生了美滋滋的感觉。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我对这些国人的这些感情露出了鄙视的眼光，乃至出现了憎恶的情绪，认为决不能以此作为判断中国人的人、事、物是非的标准，我们不仅应欢迎外国人研究中国，中国人也当了解乃至深入地研究外国的人、事、物。至迟，我在吉林大学开办考古专业的时候，就已有深入研究外国考古学的追求。

杨建华教授走到西亚考古研究与教学，与我有着直接的关系。

作为工农兵学员的杨建华还在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学习的时候，我就看中了她的英语能力。为了了解她为什么有那样的英语能力，和她谈过话，得知她得益于家教，并对她说，希望她继续把英文学好。杨建华从不张扬，性格文静，见人遇事均内心有度，却为人低调，能坐下来钻研学问。我对她这一印象，使我产生了她毕业后将她留下来攻读外国考古学的想法。1976年上半年和1977年上半年，她所属的班级被安排在燕下都和团结遗址实习。实习后期，我去帮助和指导工地整理发掘资料，便挑着杨建华和孙建华跟着我摸陶片，让她们了解怎样摸陶片，跟我学习类型学。1978年，正当她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就她是否留校的问题，我和专业另一位负责同志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结果是依我的意见做出了决定，将她留校了。但让她专攻外国考古学，是在这两年后，才付之于实践。

1980年下半年，我安排杨建华去新开工的白燕遗址工地作学生的实习辅导工作。在寨疙瘩发掘进入后期，又在白燕村旁的棉花地新开了一个发掘工地，安排她主持这个工地的发掘工作。这些工作的安排，无疑是为了让杨建华过好田野考古关，练就田野考古硬本领。1981年上半年，根据吉林大学和美国罗格斯大学的协议，诺曼·哈蒙德到吉林大学考古专业讲授玛雅文化，我便安排杨建华担任翻译，目的是让她了解外国人是怎样研究

考古学的，以及锻炼她的考古专业英语能力。1982年春，我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杨建华要报考我的硕士研究生，经过我同她的商量，便将她的研究方向确定为西亚考古。为什么让她搞西亚考古呢？这得慢慢道来。

一是我个人和杨建华个人的原因。还在1956、1957年，我就认真地读过苏联通讯院士考古学家吉谢列夫著作的《南西伯利亚古代史》，20世纪50、60年代，又广泛地阅读过苏联学者著作的中亚、蒙古和西伯利亚的一些书籍，1965、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当时吉林大学总支书记李木庚在历史系组织了一个我任组长的东北考古组，任务是搜集苏联考古学者奥克拉德尼科夫的一些反华言论，并撰写反驳他的言论的文章。奥克拉德尼科夫是从考古学方面来进行反华的，因此为了搞清楚他反华言论的依据，就得同时研究他涉及的考古学本身的及与其相关的东北考古学发现与研究的状况。这样，除了上述两项任务外，我又为东北考古组增列了研究苏联的东西伯利亚、滨海州和我国东北考古这一任务。通过我个人这一经历的体会，同时考虑到当时直接到国外学习、研究外国考古学难到几乎不可能的情况，就形成“由内到外”“由近及远”研究外国考古学的主张。所谓“由内到外”，即从研究中国边境地区考古入手，及时地扩大和中国边境地区相邻的外国考古学；所谓“由近及远”，即由与中国相邻的国家逐步扩大到世界各国。至于为什么没有按照我这一主张安排杨建华的研究方向，是因为我虽涉猎过蒙古、西伯利亚、滨海州和中亚地区考古学资料，但这方面知识仅仅是碎片式的，缺乏基本系统的乃至大致轮廓的认识，当然没有能力指导研究生攻读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考古学。同时，又由于杨建华不懂俄语，不能阅读有关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考古资料。

二是安排杨建华以西亚考古为研究方向的直接原因，是当时中国考古学的形势和杨建华本人的英语能力。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亚考古得到了巨大发展。我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推行的自我封闭政策，使我们在这方面情况毫无所知，改革开放以后，林志纯教授一马当先，将西亚考古学成就介绍到了中国，前陶新石器、有陶新石器、农业起源与农业革命和城市革命这些概念传进了中国，引起了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关注，这些术语名词便在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史学著作中广泛流传起来。到底西亚考古学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我当时急切求索并求回答的问题。我个人的条件，因英语不行，实难以进入这个为英语所统治的西亚考古的世界。杨建华英语很好，又经历过中国考古学的严格训练，且我又能为她找到林志纯这样权威的教授对她进行指导，这样，在这主、客观条件下，她便成为进攻西亚考古学合适的人选。

提到林志纯教授，我得多说几句话，以表达我对他的深切怀念。林志纯教授已于2007年逝世，享年97岁。他是我的史学前辈，还在学生时代，我就读过他的著作。我到吉林大学任教后，到东北师范大学拜访的先生，第一个便是林志纯。他比较看重我，20世纪80年代邀我为他的研究生授课，提挈为编印世界古典文明丛书的发起人和编委，以及担任中西古代文明辞书撰稿人及编委，于20世纪90年代，他又聘我为东北师范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名誉教授。我一直敬重他的为人与治学。林志纯教授在学术上以日知之名著称。他是一位单纯的学者，生活简朴，走进他家里看到的尽是书，他那瘦矮的个子，似乎被埋在这书堆中。他思维敏捷，言语快速，精力旺盛，却不问他事，一生只知教学与研究。他学贯中西，早先研究过中国史。20世纪50年代发表过涉及郭沫若史学观点的论著，遭到郭沫若的痛斥，从此以后便转入研究世界史了。自20世纪50年代后，他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创造了两个高峰，一是在20世纪50年代，他和到东北师范大学讲学的苏联学者共同办了一个世界古代史研究班。进入这个班的是一些20世纪50年代前期大学毕业进入高等学校从事教学与研究的学人。他通过这个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并将苏联的世界古代史学引入到了中国，冲击或改变了欧美的世界古代史学统治中国的局面；二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他在东北师范大学先后成立了西亚、北非、欧洲上古史研究室和世界古典文明研究所，撰写了《世界上古史纲》，将欧美的世界古代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引进中国，为中国的世界古代史学以及中国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带来了新鲜空气，掀起了一股新的浪潮，在许多领域推动了对中国考古学、中国古代史和中国的世界古代史的重新研究，使这些领域出现了崭新的一派勃勃生机。林志纯教授的学术贡献当然还不止这些。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他又回归到中国古代史学领域，对中国古代文明展开了研究。在这方面他做出的贡献颇丰，主要有如下两点，一是他率先主张并着力推动以城邦的视角研究中国先秦时期的古代文明；二是他对将FEUDALISM一词译为“封建主义”提出了质疑，认为FEUDALISM和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封建”一词所指史实和含义均不相符，FEUDALISM一词所指的西欧中世纪社会也和中国近代文献中所说的中国封建主义社会或中国的封建社会区别甚大。他的这些研究，直指中国是否存在着FEUDALISM这词所表述的社会的认识，对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无疑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从而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反响。我能请到林先生和我能跟随林先生一起共同担任杨建华硕士研究生导师，既是杨建华的福祉，也是我的荣誉。

我对杨建华的学术指导，仅是如下几点，一是要扎进原始资料中去，

二是要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论即考古学文化谱系论的视角解析西亚的古代文化，三是从遗存、时、空这三维或人、遗存、时、空这四维的观察与比较去解读西亚古代社会结构的变迁，而直接贴近西亚古代的学术指导，则全是林先生的工作。杨建华就在林志纯教授指导下开始了她走向古代西亚研究的征途。

快32年了，杨建华终于向读者呈献出《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这部著作，报告她在研究古代西亚征途中已走到哪一路程。作者在这一著作的后记中说，她在这30年中磨成了三把剑，即：第一把剑是1994年出版的《两河流域史前时代》；第二把剑是她此后发表的一些专题论著；第三把剑是这本《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在我看来，这三把剑其实只是一把剑，即《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为什么说只是这一把剑？因为杨建华说的前两把剑只是铸成这把剑所准备的仅具阶段性质的材料和思考，是为铸成这把剑所作的准备性程序的两道工序，相对于《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这把剑来说，还不能构成一把剑。当然，杨建华不只是铸成这一把剑，她还铸成了第二把剑，或为铸成第二把剑做了相当的准备工作，这就是她在后记中所说的她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对中国北方青铜时代与欧亚草原的文化关系所作的探索。我读过她在这一领域所作的研究的一些著述，我感到她不仅很用心，而且也颇有独到的见解，其中相当数量的见解，是其他中国学人难以感悟到的。

至于直面《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这部著作，我要说的则是：这部著作不是像中国的某些世界史学者所写的其实是外国学人著述的世界史的译编，也不是国外学人研究两河流域即西亚的核心地区考古与历史所结出的成果的综述，而是以主流的中国考古学人所擅长的考古学文化分期和创造的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分析的研究方法，解析了两河流域已发现的大量考古学文化的资料的基础上，同时汇集了经杨建华通过对众多国外学人论著的梳理，而能被她视为可从其中吸收的那些正确的学识与成果，著述出来的具有中国考古学主流学人处理与分析资料的理论及方法，并充分表达了杨建华经常年研究所得到的认识的一部著作。这部著作阐明了两河流域及其相关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的文化谱系，和诸考古学文化乃至其期别的时、空框架，并在这一基础上，从遗存、时、空这三维，或人、遗存、时、空这四维观察到的差异、矛盾和关系的比较研究中，观察出来的两河流域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及社会体制的演进旅程，同时，进而对两河流域走向文明社会和形成的文明社会做出了规律性探讨。她按照自己

的见解，把这些故事讲得清清楚楚，而使《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成了一部基于考古学求索历史的专著。然而，杨建华没有将她的这一著述停滞在专著之中，而是力图写成既让大学考古专业学生，又让大学历史专业学生，还让对考古学和历史学感兴趣的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朋友都能看得懂的著作，为此，她在著述思路和文字表达诸方面下了不少工夫。我看她在这方面的努力没有白费，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可以说，实现了深入浅出，将为这书争取到更多的读者。

杨建华成功了，我32年前的愿景通过杨建华的实践得到了体现。在我主持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期间，杨建华是被我安排的第一个研究外国考古的学人，在她之后，我又先后安排了徐光辉和冯恩学两位年轻学人分别研究朝鲜及日本考古学和西伯利亚考古学。徐光辉于20世纪90年代已去了日本。关于安排他研究日本及朝鲜考古一事可说半途而废，令我遗憾！可喜的是，他在日本却发展了自己，加盟和推进了日本的中国考古学研究，并为中日两国的学术交流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冯恩学仍在坚持，并做出了相当的成绩。我离开吉林大学后，吉林大学考古系添加了研究西伯利亚和蒙古考古学的潘玲。通观中国，可认为是研究外国考古的中国学人也就是这么几位。至今吉林大学仍是研究外国考古学的唯一的中国重镇。然而这一中国的唯一研究外国考古学的重镇所研究的外国考古学的领域，也仅是西亚、蒙古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而已。在世界全球化的今天，目视或想到我国研究外国考古的这样的状况，不仅心觉孤寂，也身感凛冽。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为杨建华这一著作作序，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写序的首要原因。

张忠培

2013年11月21日晨成稿于小石桥

前 言

两河流域（Mesopotamia）在希腊语中是两河之间，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之间的意思。

7000年前，当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和大多数人还过着打鱼和狩猎的生活时，这里不但早已产生了农业，而且超越了原始粗放的旱作农业阶段掌握了灌溉农业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市文明。

五千年前，当中国的文明刚刚兴起时，这里的上层贵族已在使用人类最早的文字，这里还诞生了人类最早的学校、人类最早的图书馆、人类最早的史诗。到3700年前，出现了人类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法典——汉谟拉比法典，迄今为止，这部由古巴比伦国王颁布的法典依旧是现代欧洲人学习法律的入门之作。

正是这样，两河流域文明一直被西方世界看成是西方文明的源头。

提到西方文明，就不能不说到其他文明，对于我们来说，更关注东方文明。对此，芝加哥大学的何柄棣先生在所著的《东方的摇篮》中，就把两河流域看成西方的摇篮，把中国文明看成东方的摇篮。这两个文明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处。相同点是，二者都具有一样的原创性（pristine），她们是人类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独立创造的。但二者进入文明的道路却又是不同的，譬如两河流域迈入文明门槛后所创建的最初国家，是规模很小的以一个城市为核心的城邦（city state）。换句话说，两河流域自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的过程，是从农业村落走向城市文明进而创建国家的历史。

复原或重建这一历史过程的史料，几乎全部来自于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更确切地说，是源自圣经考古。因为在西方最古老的宗教经典《圣经·旧约·创世纪》的记载中，两河流域以及西亚是人类起源的伊甸园。这也促使西方世界更加关注这一地区的史脉，许多国家都到这里从事发掘与研究，使这里真正成为了国际合作的舞台。

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为了寻找《圣经》所记述的古老文明和刻有大洪水记载的泥板文书，开始了在两河流域的考古调查与发掘，最早发掘的是北部亚述（Ashur）帝国和南部巴比伦王国的遗址。20世纪开始，两河

流域的考古进入了黄金时代：上半叶，发现了年代更早的苏美尔早王朝与前王朝的遗存；下半叶，开始揭示人类更早的农业起源的历史。即便而今，两河流域流经的主要国家伊拉克因战乱频繁已罕有发掘，而两河北部的叙利亚和土耳其南部也只有少量工作，但这里的考古转入全面的综合研究阶段。换言之，两河流域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研究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中国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但老一代历史学者、考古学家如林志纯、毛昭晰、夏鼐等，对这一地区的古文字、历史，特别是对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起源等的发现和研究，却不乏关注，很早就订阅了大量这方面的重要学术期刊，笔者和本书就是受惠者之一。换言之，笔者作为考古学人，也自20世纪80年代前后开始，就以两河流域和西亚为中心，撰写过硕士论文《试论萨马腊文化》为主的一系列研究文章。在这个过程中，正值中国考古学的学术发展进程步入了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国家形成的发现和研究阶段。毫无疑问，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还有赖于对其他古老文明的起源与国家形成的比较和分析。这正如张光直先生所倡导的用世界史解释重大历史变迁的模式，来考察中国史前史和古代历史的变化过程，探寻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曾长期缺乏关注全球的学术视野。而当今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已经认识到，如果在做好本国课题的同时，还能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研究，获得更大的格局和视野，将会使我们的学术研究不断更新和取得突破。因此，中国考古学提出了“21世纪是走向世界的考古学”的主张。这也就是说，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文明，世界的和谐与稳定需要各种文明的交流与沟通，尤其是东西方文明的交往。而这种交往是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要理解西方文明就要从它的源头——两河流域文明说起，从她的史前史和古代史说起，甚至还可以从中发现中国与两河流域及西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虽各有特点，却又相得益彰。

从遗存的形式看，西亚与两河流域古代遗存最大的特点是泥土的广泛使用，巴比伦王国常见的塔庙和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笔下的巴别塔都是泥土建筑最宏伟的形式。最初的印章是泥质的，筹码是泥质的，文字的载体也是泥质的，建筑是泥砖建成的，而且建筑废墟由于层层叠压，形成了被保留下来的土丘。当这里的考古发掘技术解决了寻找泥砖走向的技术以后，一个个建筑布局和一个个完整的聚落布局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正是中国考古中非常缺乏的资料；但是那里的考古学家不知是无暇寻找还是

不会寻找地表上没有任何迹象的墓葬，致使这方面的成果寥寥，而中国史前考古中丰富的墓葬资料，或许可以为西亚与两河流域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从研究方法看，国外学者多从理论与社会发展的角度，阐释和把握古代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国学者更多的是利用类型学和聚落布局的方法，把具象的遗存归纳上升到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的高度。两者相比，国外考古研究缺乏对具体遗存的细致分析；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则有待提高抽象化和概念化的能力。

张光直先生曾经提出“用从中国古代史和从中国古代史发展本身看到的法则，来丰富一般社会科学的理论”的任务。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要把遗存的微观研究提升到社会发展的法则这个层次。本书采用了宏观与微观结合的办法。与中国的研究相比，它努力把微观的遗存研究提升到社会发展变化的高度来认识；与国外的研究相比，它使得社会发展理论有详尽的考古资料分析来支撑，从而为中外同行都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

人类对发明文字以前的历史的研究绝大部分是由考古学者完成的。但是考古不等同于历史。人类的历史既是思想史又是行为史，而考古学者解释的过去社会的物质遗存没有直接反映出这些。从纷繁复杂的考古发现到构建一部史前史是对人类智力的挑战。智力不是知识，而是把人们拥有的知识整理成逻辑形式的的能力。从考古发现到史前史的建立要经历几个过程：首先是对考古发现进行遗存、时、空和人四个维度的研究，得出一些考古事实，在这个研究过程使用的都是考古学的语言。然后再探寻这些考古现象背后的历史意义，这一步也是由考古学者完成的。时间毁掉了遥远过去的许多证据，使得我们必须和技术问题上花费很多时间，以便确定事实。但是还有很多考古事实背后的历史意义无法知道，因为考古发现的遗存对于过去发生过的历史几乎就是点和面的关系，用点推面是对用考古发现重建历史的巨大挑战。笔者努力希望做到在自己的头脑中创造的是符合史前两河流域状况的形象，但是可能越是努力弄懂事实，所写的内容就越是富于推测性。所以，本书的重点是描述而不是解释，因为对于考古现象的准确描述是任何理解或解释尝试的根本基础。

在重建史前历史的过程中，考古学文化是基本的社会单位，它们代表了存在于一定时间与空间、使用相同衣食住行用品和具有相同传统与宗教的人群。考古学文化的时间与空间是构建历史最基本的要素。但是我们又不能过分关注它，因为这样可能会妨碍我们理解过去社会和文明的本来面目：个人和集体生存问题的解决办法以及人类慢慢服从于具有一定规模和征服野心的，以及日益复杂的政治组织的过程。这些政治组织从小而原始的阶段

发展到规模增大、出现等级制度并吞并许多小的群体时，就成为了国家，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就是以寺庙为主导的政治上分散的城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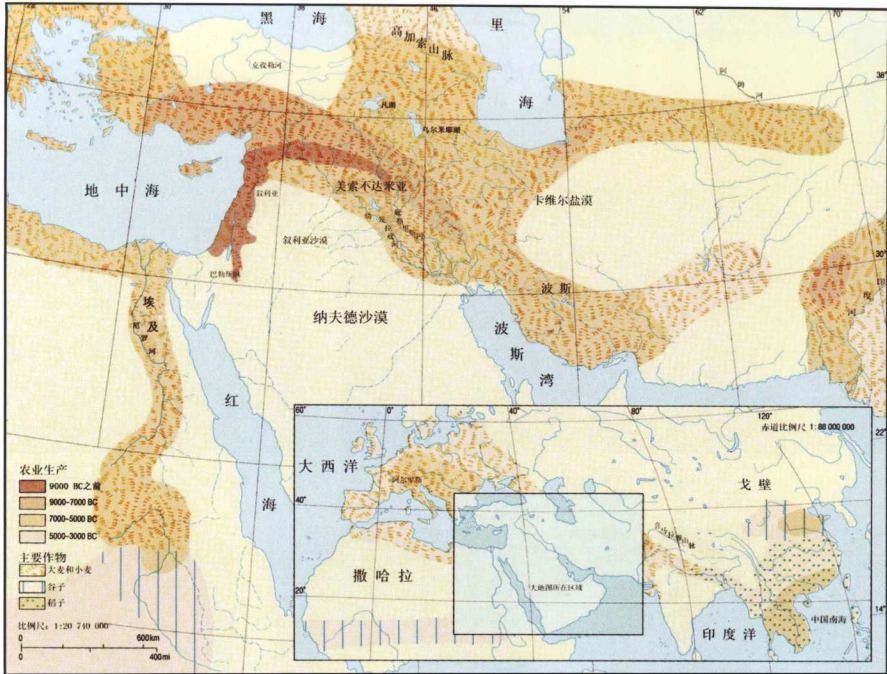
英国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在20世纪30~40年代，提出了考古研究的两个重大课题，即农业革命与城市革命。他认为，在人类使用火和发明蒸汽机之间，最重要的两个事件就是农业和城市的出现。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火的使用是人类第一次有目的地利用自然；农业的出现使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由狩猎采集变成畜牧农耕，人类在面对自然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城市革命通过调整社会关系如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的等级化提升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蒸汽机引领的工业革命是利用科技手段提高人类的生产力。在西亚与两河流域，农业和城市的出现在世界上都是最早的。本书将揭示人类最早发生农业与城市的过程。

本书是笔者从事西亚暨两河流域史前考古三十年的研究。在第一个十年，笔者完成了西亚暨两河流域史前时代时空框架的建立，梳理了各考古学文化的特点及相互关系；在第二个十年，国际学术领域的研究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由发现转入研究，发表了很多经典的个案研究，结合这些研究笔者对环境与生业的关系、聚落的发展、宗教建筑功能的演变以及生产和交换方式的进化等方面进行了微观的考察；最后这个十年由于新资料的丰富，笔者对更早的农业起源以及更晚的乌鲁克（Uruk）时代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合。全书的体例分为两河流域文化背景的西亚（上编）和两河流域从平等社会走向城邦国家（中编和下编）两部分。在两河流域的研究中是按照考古学研究的三个层次进行：基础研究是以考古学文化为单位建立的时空框架（中编第一章），这是一个二维系统，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中层研究是对社会的经济、社会组织 and 宗教艺术的重构（中编第二章~第七章），使得原有的二维系统变为三维系统，给历史框架赋予血肉，使其丰满起来；最高层次是通过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比较，重建两河流域从平等社会的农业村落走向城邦国家的历史过程（下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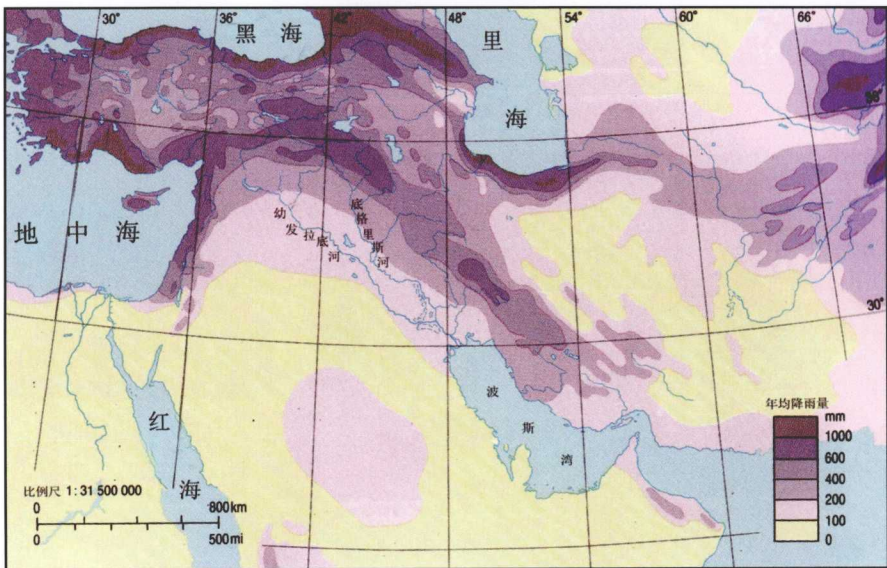
两河流域以及西亚地区的考古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所以要找到一张很全的遗址分布图是很难的。书中采取了分时段遗址分布图。图中的遗址为了方便读者进一步查找，保留了英文原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河流域遗址处于战火不断的状态，考古发掘很少，仅限于上游的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地，但是考古研究仍在深入。所以书中使用的资料很多是以前用过的，但是研究的方法与视角则有很大不同。另外，本书的图版中除了旗标（图版六，2）来自考古报告外，其余均出自Michael Roaf的著作《Cultural Atlas of MESOPOTAMIA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Facts on File》

(New York & Oxford, 1990)。

最后要说的是，就在本书即将完稿之际，笔者在最近一期中国权威的史学刊物上看到了一篇讨论世界史前史的文章。所没有料到的是，在时代已经进入到21世纪的今天，作者竟完全不引用100年来世界各地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来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相比之下，考古界在不断发现与研究地下的新史料，秉承“以物论史、透物见人”的学术追求，无疑客观得多、真实得多，也更科学得多。于是，本书努力把读者群从考古学者扩大到历史学者，为考古和历史等学科乃至史学爱好者们，提供两河流域和西亚地区的考古新发现与新研究成果，并尽量多地选配一些国内学者很难见到但又有助于加深理解的好图和好照片。这些努力体现了考古学界，特别是笔者这个从事了30年两河流域和西亚地区考古研究者的责任和担当。



1. 西亚农业起源分布图



2. 西亚降雨量分布图